



二里头遗址三号建筑院内墓葬探讨

邵向平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覃 覃

摘要：二里头遗址3号建筑内的贵族墓葬是目前所见二里头文化前期最高等级的墓葬。本文对这些墓葬所汇聚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综合讨论，并将墓葬置于宫殿区的营建过程中考察，进而认为这些墓葬的意义应在早期国家权力建构的背景中去理解，墓葬位置的选择及其体现的文化因素的汇聚整合，都应提升王室权力的努力有关。

关键词：二里头遗址；墓葬；早期国家；王权

Abstract: Elite burials in the No. 3 palace at Erlitou are of the highest rank among all tombs dating to the early Erlitou culture. This article analyses features of diverse regional traditions that can be observed in those tombs,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latial-area construc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ose burials should be investigat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power. The location and the diverse regional features should be related to efforts to strengthen the kingship.

Key Words: Erlitou site; Burial; Early state; Kingship

二里头遗址3号、5号建筑东西并列，位于宫殿区东部，年代属二里头文化二期^①。两座建筑院内都发现了若干与建筑同时期的贵族墓葬，尤其是3号建筑中院的M3内出土了绿松石龙等重要遗物，引发了广泛关注。学者对M3的等级、墓主身份、文化因素构成，以及相关的3号建筑的性质都进行了深入讨论^②。不过以往的研究多侧重M3及其内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等，若着眼于墓葬群体，则在葬俗、出土器物及与宫殿建筑的关系等方面仍有进一步阐发的余地。本文拟综合以往研究成果，对3号建筑内贵族墓葬所体现的文化因素汇聚与整合现象进行探讨，并尝试在

宫殿区营建过程视角下阐释这些墓葬的意义。

3号建筑是一座(组)至少有三进院落的组合式建筑，位于宫殿区东部偏北，大体位于2、4、6号建筑下，西侧隔道路VG1与5号建筑相邻。发掘者认为包括主殿在内的中院可能建于二期早段，在二期晚段经过改建，而北院和南院可能为二期晚段新建。在3号建筑中院路土层中发现东西并列的墓葬2座，位于主殿南部偏西，编号2001 V M1、2001 V M2，年代均属二期早段。南院内西北部发现有东西并列的墓葬3座，自东向西为2002 V

M3、2002 V M4、2002 V M5, 年代均属二期晚段。其中 M3、M4 相距稍远, 发掘者推测两者间还存在一座墓葬, 被 H46、H76 破坏, 仅存北部墓圻轮廓^③。另外, 南院东南还有 1 座小墓 2003 V M7, 被破坏严重, 年代也属于二期晚段。该墓与其他墓葬相距较远, 且规模、葬俗差别较大, 本文暂不讨论。此外, 因 3 号建筑被晚期基址叠压, 仅做局部揭露, 院内当还存在有其他墓葬的可能。

《二里头》报告将 1999—2006 年发掘的墓葬分为 3 个等级, 3 号建筑中的 M1—M5 均属 I 级墓。李志鹏曾对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做过系统研究, 将全部墓葬分为 5 个等级^④。依李氏标准, M1—M5 也都应属于 I 级墓; 二里头文化一期目前尚未发现属于第 I 级的墓葬, 二期的 I 级墓除 3 号建筑内的几座墓葬之外, 尚有 1981 V M4^⑤和 1982 IX M4^⑥。不过据叶万松、李德方、许宏的研究, 这两座墓葬的年代很可能都已经到了二里头文化三期^⑦。若此, 3 号建筑中的 M1—M5 是目前已刊布的二里头文化前期等级最高的 5 座墓葬。二里头文化二期是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获得迅猛发展的重要时期^⑧, 这 5 座二期高等级墓葬的出现可能并非偶然, 其意义应在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

这 5 座墓均为南北向, 其中中院内的 M1、M2 因未见人骨, 头向不明; 南院的 M3、M4、M5 方向在 350—356°间, 其中 M3、M4 明确是头向北。已有学者指出, 二里头文化大多数墓葬为北向, 且多为北偏西^⑨, 故这五座墓很可能都是北向墓。北向应该是包括最高统治阶层在内的人群的主流墓向。二里头遗址有部分南向墓, 见于 IV、V 和 IX 区, 其中 IV、IX 区者以二、三期居多, 不少出有玉石器、漆器甚至铜礼器, 或有较多陶器, 有一定等级^⑩; V 区的南向墓多属四期, 规模较小, 以宫城东墙附近较集中, 有的打破宫墙, 情况应较特殊。值得注意的是, 在已发现的二里头遗址二期墓葬中, 南向墓占已知墓向墓葬的近半数, 似乎表明此期与最高统治族群有一定差异的人群占相当数量, 且其中有部分贵族。

中原地区除陶寺之外的龙山时代墓葬中, 很少见木质葬具, 二里头文化一期墓葬中也未见有葬具者。从二期开始, 一些墓葬中使用木质葬具, 并且出现了在墓内铺撒朱砂的现象。M1 墓底有灰痕, 可能为木质葬具, 并且铺了朱砂。M5 未见葬具, 但“可能有熟土二层台”, 不知是否与木质葬具有关。此外, M3 墓底也有零星朱砂^⑪。中国现代朱砂矿的分布以西南地区最多, 西北地区也有一些, 二里头的朱砂应是远距离交流的结果^⑫。方辉指出, 与其前的文化相比, 二里头文化中朱砂的使用更加规范, 成为贵族葬仪中的普遍用品, 朱砂在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出现可能与此期文化实力的强盛有关^⑬。木质葬具的使用也应该与二里头文化所属人群新的葬仪的构建有关。

这几座墓出土的陶容器以鼎、盆、平底盆、豆、爵、盃、高领罐(尊)为主, 另有罐、器盖等。除 M2 被扰较甚, 未见出土物外, 余 4 墓的陶容器数量都在 10 件以上。鼎、平底盆、豆、高领罐(尊)和盃在一墓中可以有多件, 且形制或质地常有差异。这是本地龙山时代以来以陶器随葬的顶峰, 似乎有以陶器数量和形制变化显示地位的倾向。三期以后, 随着铜、玉器的增多, 高等级墓葬出土陶器的数量又有减少的趋势^⑭。

随葬容器之中, 酒器的地位较为突出, 不但数量较多, 且多有以其他珍贵材质为之者。如 M1 出有白陶盃 2、爵 1 及硬灰陶“壶”残片 1 件, 后者鼓腹, 有宽带状鋈, 可能是和 M5 封顶壶形盃同样的器物^⑮; M3 出有灰陶盃 3、爵 1; M5 出有灰陶爵 1、原始瓷盃 1 及白陶盃、鬻残片各 1 件。同时期其他墓的酒器组合中常见陶觚, 这几座墓中均不见陶觚而有漆觚。其中 M3 明确有漆觚 1, M5 有漆觚 2, 其余不辨器形的漆器中应还有觚。这些墓当是以陶或瓷盃、爵与漆觚搭配, 形成核心酒器组合。从盃(鬻)的数量看, M1、M3 和 M5 的酒器组合似可达 3 套。

龙山时期的白陶鬻、盃以黄河下游最多^⑯, 而中原地区少见, 二里头文化前期白陶的

兴盛,应与来自黄河下游的影响有关。三期以后白陶减少,李志鹏认为是礼器系统由以白陶为主体演变为以铜器为核心^①。M5的原始瓷盃是中原地区最早的原始瓷,M1的硬灰陶“壶”也是较早的硬陶器,两者的器型应均为封顶壶形盃。据以往学者研究,封顶壶形盃(或称“象鼻盃”)始见于龙山晚期,而以二里头文化二期数量最多,其中以原始瓷和硬陶制作者应与东南地区文化的交流有关^②。

史前漆器也以东南地区发现较多^③,黄河流域主要见于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和山西临汾陶寺遗址^④,二里头文化二期时突然增多^⑤。二里头3号建筑中的5座墓葬中,除M2外,余4墓中均有漆器。其中M4、M5中分别多达7件和11件,种类可辨者有觚、豆、匣、勺及一些圈足器、圈底器。与此相关的是,M1、M3和M4出有圆陶片1-3件不等,这也是二里头文化墓葬中首次出现圆陶片,其数量与墓葬等级有较密切的关系^⑥。发掘者已经指出,一些圆陶片可能是漆器配件^⑦。目前还难以得知二里头生漆资源的来源与漆器生产场所,但漆器在此期的大量出现,也应和二里头文化势力的增长有关,显示了二里头贵族对珍稀资源的多元需求和强力攫取。

M1、M5各出有1件玉柄形器。根据目前资料看,此类器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出现,流行于夏商西周时期,至春秋时期衰落^⑧。关于其功用的说法很多,有学者注意到此类器物常与铜、陶或漆礼器,尤其是酒器共存,认为应名为“琕”,是裸祭用玉^⑨。从墓葬平面图上看,这两墓所出玉柄形器的附近均有漆器。此外,M3出有1件玉鸟形器,形制与M5所出玉柄形器相似,惟其在墓中的位置贴近陶鼎。邓淑萍指出,这三件玉器均属“后石家河文化”玉器^⑩,这意味着源于江汉地区的因素被整合进了中原王朝礼仪系统中了。

关于M3的绿松石龙形器,已有研究很多,学者多认为有礼器性质^⑪,且与铜铃关系密切^⑫,而二里头时期的铜铃也被认为有礼器性质,可能用于宗教场合^⑬。该墓还出有海贝串饰1组,秦小丽指出绿松石镶嵌器、海贝

和玛瑙在时空分布上有较高契合度,三者均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首先出现于西北地区,在原料来源上可能有一定关联^⑭。中国境内的海贝始见于甘青地区,且在早商及其以前几乎不见于长江以南地区,其经由西北地区传入中原的可能性很大^⑮。科技分析表明,二里头绿松石来源复杂,部分来源于鄂豫陕绿松石矿床北矿带的云盖寺等地^⑯。这都体现了二里头贵族汇聚不同地区的珍贵资源,整合、创造自身宗教礼仪的努力。

出土陶器的4座墓中,陶器均被打碎,应即所谓“碎物葬”或“毁器习俗”。从墓葬平面图上看,M1中的陶片尤其碎,铺在墓室中南部;M4陶片似覆于人骨之上;M3、M5的陶片则集中于墓室东侧。黄卫东将史前时期的“碎物葬”分为打碎器物为死者陪葬、打碎器物以装殓死者等类型,其中完全打碎陶器随葬的习俗以黄河下游和长江中游最集中,完全打碎陶器以敛葬者主要集中在山东地区^⑰。中原地区后岗二期文化的一些儿童墓也有以打碎的陶器覆身或覆盖头部的^⑱。但作为二里头文化前身的王湾三期文化中,墓葬中多无随葬品,有随葬陶器者也不见毁器现象。不过一些祭祀坑中却有类似以陶片敛葬的现象,如登封王城岗W5T2372H64中的儿童身下铺有一、二层陶片^⑲,洛阳王湾H11成人女性骨架之上及其周围布满一层碎陶片^⑳。整体而言,史前诸文化中的毁器习俗都不普遍,且打碎陶器以敛葬者多为儿童。二里头文化墓葬中流行的毁器习俗可能与黄河下游或长江中游文化的影响有关,但经过了一番改造和扬弃,其背后应伴随着相关丧葬观念的传播和变异。

综上,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3号建筑中的贵族墓葬,汇聚了不同地区的资源,并且整合为有自身特色的葬俗和礼仪。其中很多因素是在二里头文化中首次出现,有的则是在原有基础上发扬光大。这当然可能和目前一期墓葬发现较少有一定关系,但结合二里头文化在二期时的迅速发展和急剧扩张来看,上述墓葬的出现很可能是此期二里头文

化步入强盛的客观反映。不同地区资源的空前汇聚和强力整合,实际上体现了二里头社会上层控制稀缺资源,从等级、礼仪和宗教等方面进行社会整合,构建早期国家秩序的努力。

对于这批墓葬,还应放在其所在的建筑乃至宫殿区的布局和营建过程中考察。3号建筑因院内有贵族墓葬,且布局上与其上的2、4、6号建筑前后相继,2号建筑又多被认为是宗庙建筑^⑩,故学者多认为3号建筑也是宗庙性质的建筑^⑪。从布局看,3号建筑的多进院落构成了封闭、神秘的纵深结构,从南院二期晚段的墓葬到中院二期早段的墓葬,在空间上似恰好形成巫鸿所谓“向遥远过去进行回溯的编年顺序”,表达了“不忘其初”、“反其所自生”的礼仪观念^⑫。虽然目前尚难以确切论定3号建筑的性质和功能,但其有宗教性质,且其空间结构是特定礼仪程序的呈现应无疑义。

3、5号建筑之外,在宫殿区的1、2号建筑之间^⑬以及1号建筑的西、南也发现有二期的夯土,后者的范围已超出晚期宫城城墙^⑭。不过赵海涛指出,宫城内二期夯土的范围不一定很大,但却有着较大面积的灰土和灰坑,与三期以后宫城内生活类遗迹较少的现象形成较大反差^⑮。这表明二里头文化二期宫殿区的布局和三期以后有较大差异。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在遗址Ⅵ区、Ⅸ区发现有年代不晚于二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其中Ⅵ区的一座东西长约百米;Ⅸ区的一座南北不少于120米,东西宽不少于80米^⑯。若勘探无误,则意味着宫殿区范围之外有着规模不亚于宫殿区的高等级建筑,其使用者的身份值得深思。前文已述及,Ⅸ区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有一定数量的南向墓,且有一定等级。如果不同墓向意味着人群差异的话,则宫殿区外可能存在着不同族群的贵族群体。从建筑规模看,其势力在二期时甚至可与王室抗衡。

若上述推测不误,则围绕3、5号建筑等营建宫城,构建更大的排他性空间,乃是提升王室权力的必要手段。宫殿区四周的大道在

不晚于二期时已经出现。刘绪指出,笔直的大道应依靠地上设施或标识才能形成^⑰,这意味着可能与3、5号建筑大致同时,已开始规划独立的宫城空间。二、三期之交进一步建起宫城城墙,与宫城外的贵族聚居区相隔,为王室制造了更为独立、尊崇和安全的空间。从这个角度看,3、5号宫殿内的墓葬,应是王权逐渐稳固的过程中出现的,其位置的选择很可能与提升王室地位的努力有关。

至此我们可以对这些墓葬的墓主稍作讨论。以往学者多认为M3是与宗教、礼仪活动有关的贵族^⑱,个别学者则推测是王墓^⑲。从埋葬位置、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情况,尤其是绿松石龙形器等有宗教意味的器物来看,这几座墓的墓主确有可能是与宗教有关的贵族。但如果考虑到龙山时期的中原地区除陶寺文化之外,普遍不重视随葬,从二里头文化开始才有逐渐“厚葬”的趋势,若以目前最明确的殷墟王陵为参照,探寻夏及早商的王墓,标准应失之过高。这样,上述宫殿建筑中的贵族墓葬,作为王室成员乃至包括王本人之墓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宗教场所与包括王墓在内的高级贵族墓葬的结合,在良渚等史前文化中已经出现。很多学者指出二里头文化与包括良渚文化在内的东南地区文化的诸多关联^⑳,二里头贵族在汇聚各地文化因素构建自身礼仪的过程中,借鉴了良渚文化高级贵族的埋葬观念也是有可能的。

墓葬与宗教场所的结合,很可能意味着墓葬也有某种献祭的性质。王立新曾指出瑶山祭坛上的墓葬有祭祀性质,“不能因为墓葬本身的高规格而否认墓主人作为人牲的可能”^㉑。唐锦琼列举多个证据指出殷墟花东M60与祭祀坑的相似之处^㉒。笔者之一也曾指出妇好墓可能有献祭性质^㉓。二里头3号建筑中的M1、M4以陶片铺、盖死者,正与花东M60、殷墟丁组基址前祭祀坑^㉔相似,也与王湾三期文化一些祭祀坑内处理死者的方式类似。二里头遗址的祭祀区中曾发现有贵族墓葬,有学者称之为“祭祀墓”^㉕,也说明墓葬与祭祀的密切关联。贵族以身献祭,既是对祭祀

对象的无上尊崇,也是借助神灵提升自身乃至家族地位的手段。

总之,二里头3号宫殿建筑院落中的墓葬,是目前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前期最高等级的一批墓葬,其身份是与宗教有关的贵族,不排除王室成员的可能。这批墓葬是伴随着二里头文化的强盛和文化分布的扩张而出现的,其随葬品和葬俗体现了二里头社会上层汇聚多种资源,攫取、巩固社会权力的努力。这些墓葬的葬仪是所在建筑内宗教礼仪活动的一部分,珍稀物品及新的、规范的仪轨不但提升了这些死者及其继承者的地位,也增强了相关建筑的神圣性。此后,随着宫城和更为宏伟的宫殿建筑群的营造以及以青铜为核心的礼器系统的兴起,二里头社会的分层更趋明显,王室地位获得进一步稳固,这可能是特定贵族的埋葬不再依附于宫殿建筑的原因。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曾与赵海涛、常怀颖、崔天兴、张莉等先生讨论,多有获益,谨致谢忱!

注释: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貳),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② 相关研究较多,可参 a. 杜金鹏、许宏:《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b. 许宏:《二里头 M3 及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考古背景分析》,《古代文明(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貳),第644、971页、第466与467页间图6-1-1-1,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④ 李志鹏:《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

⑦ a. 叶万松、李德方:《偃师二里头遗址兽纹铜牌考识》,《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b. 许宏:《二里头 M3 及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考古背景分析》,《古代文明(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⑧ 于孟洲:《中国早期国家进程关键阶段述论——以二里头文化为视角》,《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⑨ 杨冠华:《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墓葬比较研究》,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4年。

⑩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c. 郑光:《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文物出版社,1998年。

⑪ 报告未提及朱砂,但许宏先生云“墓底散见零星朱砂”,参许宏:《二里头 M3 及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考古背景分析》,《古代文明(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⑫ 董豫、方辉:《先秦遗址出土朱砂的化学鉴定和产地判断方法评述》,《东南文化》2017年第5期。

⑬ 方辉:《论史前及夏时期的朱砂葬——兼论帝尧与丹朱传说》,《文史哲》2015年第2期。

⑭ 郜向平:《王湾三期文化至二里头文化埋葬方式的演进》,《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研究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⑮ 报告第993页图6-4-3-2-2A中,是将该件陶片鏊的残端向下,将其视为“壶”的上腹残片,但若上下倒置,即与浙江江山肩头弄等地所出印纹硬陶盃(或称“象鼻盃”)下腹颇为相似,参庞小霞、高江涛:《先秦时期封顶壶形盃初步研究》,《考古》2012年第9期。

⑯ 栾丰实:《海岱地区史前白陶初论》,《考古》2010年第4期。

⑰ 李志鹏:《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⑱ a. 庞小霞、高江涛:《先秦时期封顶壶形盃初步研究》,《考古》2012年第9期;b. 罗汝鹏:《从“象鼻盃”到原始瓷大口折肩尊——论夏商时期东南地区对中原王朝的一种贡赋模式》,《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c. 李景山:《象鼻盃的“贡”与“赐”》,《洛阳考古》2017年第4期。

⑲ 石超:《浙江史前遗址出土的漆器》,《杭州文博》2012年第2期。

⑳ 叶茂林:《史前漆器略说》,《四川文物》2017年第6期。

㉑ 杨远:《二里头遗址出土漆器及其制作产地蠡测》,《文博》2018年第4期。

㉒ 李志鹏:《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8年。

②a. 陈国梁:《二里头遗址出土小件文物漫谈》,《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b.许宏:《二里头 M3 及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考古背景分析》,《古代文明(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②曹楠:《三代时期出土柄形玉器研究》,《考古学报》2008年第2期。

②a. 李小燕、井中伟:《玉柄形器名“璜”说——辅证内史毫同与〈尚书·顾命〉“同瑁”问题》,《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b. 严志斌:《璜爵辨》,《三代考古(七)》,科学出版社,2017年。

②邓淑萍:《柄形器:一个跨三代的神秘玉类》,《夏商玉器及玉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18年。

②杜金鹏、许宏、王学荣:《群贤雅集 百花齐放——“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②a. 王青:《二里头遗址出土镶嵌绿松石牌饰的初步研究》,《夏商都邑与文化(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b. 许宏:《二里头 M3 及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考古背景分析》,《古代文明(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②a. 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人类学视角——以二里头与三星堆铜铃铜牌的民族志解读为例》,《文艺研究》2009年第7期;b. 陈国梁:《中国早期铃形器——以新石器时代至二里岗文化的陶铃和铜铃为例》,《古代文明(第1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②秦小丽:《中国古代镶嵌工艺与绿松石装饰品》,《夏商都邑与文化(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②a. 彭柯、朱岩石:《中国古代所用海贝来源初探》,《考古学集刊(1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b. 王必建:《先秦秦汉时期海贝遗存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貳),第1414~1427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③黄卫东:《史前碎物葬》,《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

③a. 安阳地区文管会:《安阳八里庄龙山遗址发掘简报》,《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2期;b. 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考古》1980年第3期;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

第73页,大象出版社,2007年。

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王湾——考古发掘报告》,第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③杜金鹏:《二里头遗址宫殿建筑基址初步研究》,《考古学集刊(16)》,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③a. 陈旭:《偃师二里头遗址近年考古新发现的意义》,《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b. 杜金鹏:《中国龙,华夏魂——试论偃师二里头遗址“龙文物”》,《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c. 徐昭峰、曹蕊、赵美涵:《试谈二里头遗址宫殿建筑基址》,《夏商都邑与文化(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③巫鸿著、李清泉、郑岩等译:《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第100~1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④郑光、杨国忠、张国柱、杜金鹏:《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④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2004年第11期。

④赵海涛:《二里头遗址宫城区域考古收获初步综理》,《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④杜金鹏:《夏商考古新的发现与思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④刘绪:《若干田野考古现象分析》,《南方文物》2017年第4期。

④a. 杜金鹏:《中国龙,华夏魂——试论偃师二里头遗址“龙文物”》,《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b. 王青:《二里头遗址出土镶嵌绿松石牌饰的初步研究》,《夏商都邑与文化(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c. 冯时:《二里头文化“常璜”及相关诸问题》,《考古学集刊(17)》,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④方孝廉:《二里头遗址新的考古发现与思考》,《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④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④王立新:《瑶山祭坛及良渚文化神徽含义的初步解释》,《江汉考古》1994年第3期。

④唐锦琼:《殷墟花园庄东地 M60 的葬俗及其性质》,《考古》2010年第3期。

⑤郜向平:《殷墟小屯 M5 再探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2期。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⑤李志鹏:《二里头文化祭祀遗迹初探》,《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